

文选读

国学大讲堂

【文选导读】



屈守元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文选导读】



国学大讲堂

屈守元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选导读 / 屈守元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8.1

(国学大讲堂)

ISBN 978-7-5078-2868-9

I. 文... II. 屈... III. ①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先秦时代~梁国 (502~557) ②文选-注释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1125号

文选导读

著 者	屈守元
责任编辑	姚 兰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24.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868-9 / B · 63
定 价	36.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 高

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灵魂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学习国学必先学习元典。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元典。所谓元典，指较早产生并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元典是一种文化开始独立存在的标志，它塑造了该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华元典大多出现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因为时代久远，这些先秦典籍大多文字古奥，令人望而生畏；无法探幽致远，自然谈不上反思和扬弃。为此，我们决定首先出版《中华元典导读书系》，作为这套“大讲堂”丛书的第一辑。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

自序

《文选》是现存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总集”之首，它已流传了一千五百多年。对它的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文选》学”（或称“《选》学”），也已经一千四百年了。不仅中国历代，即邻邦日本和韩国，也有这种“《选》学”。到今天，更不止中国海峡两岸，“《选》学”已成为遍及欧美的世界性学科了。

六朝（特别是齐梁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仅仅是文学批评就有《诗品》、《文心雕龙》等，且均已成为家传户诵的经典。而文学作品的总汇——《文选》，却显得研究者有些冷落。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诗品》、《文心雕龙》的研究热潮，近来似乎有点转向《文选》了。这是十分应该，而且必要的。

我写这本书，分作《导言》和《选读》两部分。两百年前汪师韩（韩门）的《文选理学区輿》，是我写《导言》部分的向导；而六十年前高阆仙（步瀛）先生的《文选李注义疏》，则是我写《选读》部分之所取法。当然，今天的新材料，例如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唐写《集注》本以及新印的淳熙池阳郡斋本、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影印的明州本、《古籍丛残》影印的敦煌写本，这些前辈学者未见到或未全见到的，自然宜有所介绍，或加以采掇。“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学术的发展，本应该如此。只可惜我没有做好我这个“后出”的工作。

旧作《昭明太子十学士说》，载在《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中，引起“《选》学”者的注意。对于“十学士”的设置时间，有同志关心，提出异议。窃谓当时东宫既无此职官，设置时间似不必过于拘泥。本书所写，姑仍旧说。

《文选》的编辑，是很注意文学发展趋向的。它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即是齐梁文学。可现在仍有些习惯于“口耳四寸之学”的人，一提到齐梁，不顾一切，就要扣一顶“形式主义”的帽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鄙弃。按此推理，《诗品》、《文心雕龙》的作者，钟、刘两位先生也无法伸腰了。其实一般所谓“古文”家都吹捧的作品，不一定能代表《文选》，因此，《选读》部分，特选了齐梁文人如刘峻、任昉、陆倕、王巾等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如何评价，可能有争议。但有个前提：就是要请冷静下来，认真多读几遍。不然，就得取消发言权。

我的“《文选》学”，是从先师向宗鲁（承周）先生学来的。宗鲁先生有志于全部爬梳整理《文选李注》，美志不遂，中年陨落。我蠢然进入中寿，有生之年，必为完成先师遗志尽力。先师命我全部过录他所详校的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的二十一卷全书，现今已成为唯一的这个本子的影子了。写作此书，不胜今昔源流之感！

此书的稿子三十万字，全由老伴管舜英手抄。她本是“步趋齐梁”的《骈体文抄》五十年前的研究者。对此稿献疑起予，功超游夏。藜床吟病妇之行，暗牖写仙姬之韵。白头著书，得此良侣，书生之幸，亦太平之象也。

成都屈守元记

目 录

自 序	1
导 言	1
第一 关于《文选》产生时代的文化氛围	1
(1) 建安以来“文学”概念的改变	1
(2) 总集的出现及其体例的完成	4
(3) 《文选》才是真正的总集，也是现存最早的总集	7
(4) 《文选》和当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关系	11
第二 《文选》的编辑	14
(1) 昭明太子萧统	14
(2) “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的编辑	19
(3) 关于《文选》编辑的谬说	29
(4) 《文选》成书前后萧梁皇室所编辑的一些类书、总集	34
第三 《文选》学史略述	40
(1) 萧该《文选音》是研究《文选》的第一部著作	40
(2) 曹宪建立“《文选》学”，其著作及其影响	42
(3) 李善注——《文选》学的权威著作	46
(4) 李善同时的《文选》学家——许淹、魏模和公孙罗	54
(5) 《文选》学的庸俗化——五臣集注	58

(6) 唐开元、天宝间《文选》的注释、修续热潮 ——冯光震、萧嵩、陆善经等	66
(7) 《文选》给唐代诗文的影响	71
(8) 唐代《文选》学给边陲和域外的影响	77
(9) 宋代以后《文选》学的衰落	79
(10) 近世《文选》学的复兴及其展望	88
第四 清儒《文选》学著述举要	91
(1) 《文选音义》	91
(2) 《文选纪闻》	92
(3) 《文选理学区輿》	93
(4) 《文选理学区輿补》	96
(5) 《文选考异》	97
(6) 《文选李注补正》	98
(7) 《文选笔记》	98
(8) 《文选考异》	100
(9) 《选学胶言》	102
(10) 《文选集释》	105
(11) 《文选旁证》	105
(12) 《文选笺证》	107
第五 《文选》流传诸本述略	108
(1) 无注三十卷本	108
(2) 李善注六十卷本	121
(3) 五臣注三十卷本	124
(4) 六臣注六十卷本	125
(5) 集注一百二十卷本	126
第六 怎样阅读《文选》	130

(1) 对《文选》的评价要正确	130
(2) 阅读《文选》一定要口到	132
(3) 不宜用庸俗的批点法读《文选》	132
(4) 读《文选》的程序	133
附录一 萧统《文选序》和李善《上文选注表》章句	134
附录二 《选学椎轮初集》台湾版序	152

选 读	154
谢希逸 月赋（赋庚，物色，卷十三）	156
祢正平 鹦鹉赋（赋庚，鸟兽上，卷十三）	166
古诗十九首（诗已，杂诗上，卷二十九）	181
傅季友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教，卷三十六）	202
任彦升 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文，卷三十六）	208
江文通 诣建平王上书（上书，卷三十九）	219
谢玄晖 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笈（笈，卷四十）	231
应休琰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书中 卷四十三）	238
赵景真 与嵇茂齐书（书下，卷四十三）	243
陆士衡 豪士赋序（序下，卷四十六）	250
刘孝标 广绝交论（论五，卷五十五）	261
陆士衡 演连珠（选前四首，连珠，卷五十五）	296
陆佐公 新刻漏铭（铭，卷五十六）	301
潘安仁 马汧督谕（谕下，卷五十七）	317
王简栖 头陀寺碑文（碑下，卷五十九）	338
谢惠连 祭古冢文（祭文，卷六十）	373

导 言

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辑的《文选》，不仅是古代文学的必读之书，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不仅影响隋、唐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波及七、八世纪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学创作。近代以来，港、澳地区和新加坡、朝鲜、英、法、德、美诸国，都兴起了《文选》学研究的热潮；邻邦日本九州大学《文选》学史研究会编印了《文选研究论著目录》；我国台湾地区也出版了《选学丛刊》。弘扬民族文化，必须注意到《文选》这样一部文学经典巨著的整理和研究，这是无疑的。要诵习、研治这部书，非短篇小册所能尽言；讲到导读，更非浅闻陋见所可胜任。下面只准备谈点个人学习的体会，供爱好这部书，有志于研读这部书的同志们参考。

第一 关于《文选》产生时代的文化氛围

(1) 建安以来“文学”概念的改变

“文学”一词，出现很早，孔子门下的四科，便有文学。《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皇侃《义疏》：“范宁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学指博学古文。”根据这样的概念，文学不过是文献典籍之学，通晓文献，诵习文献，写作文献，润色文献，都叫文

学。当然，孔门所学的文献，主要指儒家经典。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可以见得，文学的功能之一在于修订经典。直到汉代，所谓“贤良文学”、“文学掌故”（见《汉书·公孙弘传》、《儒林传》及《盐铁论》等），“文学”的含义，基本与《论语》相同。但事物的发展，并不能老是按照孔门四科的规定，正像“赋”本“六义附庸”，却“蔚成大国”（见《文心雕龙·诠赋》）一样，文学也逐渐摆脱它作为经、史、诸子的附属地位，各自独立了。建安时代（公元三世纪初期）的这种变化，比较显著。这个时代，曾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而已集》）。“自觉”就是自我感到它是独立存在的，并不只能作为某些经典著述的附属品。

不过，文学的自觉，似乎还不能就算是“为艺术而艺术”。西方十九世纪初期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派理论，究竟如何，我无权发言。如果作为文学自觉，中外历史，都要经过这么一段历程，本有共同之点，或者不无道理。但是建安时代的文学主张，却并不是十九世纪的西方模式。

魏文帝曹丕（187～226）是建安时代提倡文章华丽的代表人物，他的《典论·论文》（见《文选》卷五十二）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这段话既阐明了文学自觉的观点，也强调了文章的作用：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是不相同的；它“不托飞驰之势”，不是经、史、诸子的附属品。

建安时代文学概念的改变，就在于它脱离作为经、史、诸子附属品的地位，认识了文学本身存在的价值；它重视了“翰墨”、“篇籍”

的作用，也没有忽略它“寄身”、“见意”的功能。刘勰叙述建安时代的文学特征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用这段话与《典论·论文》所说互为补充，对于建安时代文学概念改变的历史真实的认识就更为全面了。

建安以后，文学发展的主流，正是按照它摆脱经、史、诸子的附属地位，而又自己选择了它的意向，发挥了它的功能，独立前进的。

建安时代还出现了与文学概念的改变相配合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辑录单篇文学作品的典册，开始称之为“集”了。《后汉书·文苑传》大抵是本之西晋张鹭《文士传》（张鹭为西晋人，说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一类材料写成的。《文苑传》所载人物的作品，都只说赋、诗、颂、铭、碑、诔等若干篇。可见东汉时代还没有人把这些单篇作品编成什么集子。曹丕《与吴质书》（《文选》卷四十二），谈到“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却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又说：“观其姓名，已为鬼录。”汇聚作品，记载姓名，称之为“集”，“集”这个名称的出现，此处恐怕是很早的了。事隔五十年，西晋荀勖编《中经新簿》，把“诗赋、图赞、汲冢书”编在丁部（见《隋书·经籍志》，事在泰始十年，即公元274年），文学作品已与“六艺、小学”，“古子、近子”，“史记”平行。又隔五十年左右，东晋李充编《四部目》，更把丁部的“诗赋”与甲部“五经”、乙部“史记”、丙部“诸子”等分，基本上形成了“经”、“史”、“子”、“集”分类格局（见《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但“诗赋”仍然沿袭了《七略》分类之名，是否并包韵语以外的文章，还不可知，而且也没有用“集”这个称呼。可能文学作品在当时以单篇形式存在的情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又隔一百多年，南齐王俭编《今书七志》，有了“文翰志”的专名（南齐元徽元

年，公元473年，见《隋书·经籍志》），这就在刘宋以“儒”、“玄”、“史”、“文”四学分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见《南史·宋本纪》）后的三十四年；正式称之为“文集录”，却出现在五十年后梁阮孝绪编的《七录》（事在梁普通中，即520~527年，见《广弘明集》卷三）。那就离《文选》编辑的时间很近了。文学概念的改变，与集部（别集、总集）在文献学史上四分法中独占一分地位的形成，是有密切关系的。文献学史上的文集一类的独立，反映了文学附庸地位的脱离，作品的增多，编集之风的盛行。

（2）总集的出现及其体例的完成

《隋书·经籍志》是史志中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纂的第一种。它的叙释明确地说，集部即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继承。集部分三种，即“楚辞”、“别集”、“总集”。叙释说：“别集之名，盖东汉之所创。”这个话是否有依据，今不可知。按之上文，《后汉书·文苑传》记载各家的文学作品，实无集称。《隋志》著录的《魏太子文学徐干集》以上，凡有四十三部，属于东汉以前的别集（包括西汉以前的《楚兰陵令荀况集》、《楚大夫宋玉集》）就有十七部。说东汉始创别集，叙释与著录内容本身就矛盾。其所著录东汉杜笃诸人之集，又与《后汉书·文苑传》所载全不相应。可见东汉创别集之说，是靠不住的。把单篇作品编次为集，不可能出现在建安以前。凡建安以前人物的别集，都属于魏、晋以后的人所纂辑。

《隋志》著录的总集，以挚虞《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为首，叙释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元大德本‘又’字作‘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

则焉。”

这段话有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它把建安时代作为文学繁盛的时代，而且认为从此以后众家之集滋广。这是历史的真实。特别是众家之集滋广，为总集的编辑提供了可能，也为总集的编辑点明了必要。众家之集到建安后才日以滋广，又说明了别集的编纂是此后重视文学作品，才把前人流传的单篇，汇成集子的。集的产生与文学自觉是相配合的。

第二，它指出了总集的编辑是要经过选拣，有所淘汰的。作品多了，表示文学创作的繁荣。从多中比较、鉴别，便会出现优胜者，这是自然规律。不如此，不能提高，也无所谓发展。览者的劳倦，就在于劣品的充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的总集类序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这段话讲总集的产生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必然，很有道理。至于选家的水平，是不是会出现弃周鼎而宝康瓠的现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挚虞的书，谓之《流别》，就在于它的以文体分类。“自诗、赋下，各为条贯”。“条贯”，主要指按文体分类。《文章流别集》已经亡佚，有些情况，无法确知。但是据《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所引及《诗·关雎·疏》所述的《文章流别论》，挚虞谈诗，是以三言至九言论列的。因此，他的“条贯”，恐怕不包括文体以外的事类（如像后来把赋分京都、畋猎，诗分为行旅、赠答等）。《晋书·挚虞传》说：“又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隋志》云：四十一卷，梁六十卷）。”所谓“类聚区分”，当即指文体。总集按文体分类，既反映了作品的繁富，也反映了文学按自己发展的道路发展，脱离了作为经、史、诸子附属品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

总集（包括一些别集）的传统体例。古代总集的模式，大都采用了挚虞之书。挚虞的《流别集》是总集，而《流别论》则属于文体论范围，与同时陆机的《文赋》，都应当是最早，而又最有影响的文体论的经典著作。

第四，挚虞《流别集》和《流别论》的出现，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很大。不仅《集林》（刘义庆撰，一百八十一卷，梁二百卷）、《集抄》（沈约撰，十卷）一类书不断出现，使文章的搜辑工作更加推广，总集的编纂体例也日益完善。更重要的是为写作者提供了典范，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上面已经提到，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即建立了“儒”、“玄”、“史”、“文”四学，使谢元专领文学（《南史·宋本纪》），文学的独立地位已经稳定下来了。即在这个时代，刘义庆主持编辑的《世说新语》，专有《文学》一目，“文学”的含义，远远不是孔门四科的概念，也不是汉代“贤良文学”、“文学掌故”一类概念了。

总集的出现，从文献学史上反映了文学概念的改变，这是文学在建安以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有人认为，杜预《善文》在《流别集》之前，总集不始于挚虞（见《太炎文录》卷一《文例杂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第一，挚虞与杜预同时，他曾与杜预讨论“谅阴”之制，载在《晋书》本传。第二，杜预《善文》五十卷，《隋志》也著录，则作志之人并非不知有此书。第三，《史记·李斯传》的《集解》引秦辩士《遗章郢书》，谓在《善文》中，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已经指出。今按：《高祖本纪》的《索隐》也谓《善文》载此书。据此，则《善文》收录的，并不是集部之文，而是说言、史料。《说苑》有《善说》篇，《善文》也即此类。根据上列三项理由，把《善文》取代了《文章流别集》的总集之始地位，是不妥当的。